

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

——兼论李廌落第原因

钱建状

(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北宋元祐年间,党争激烈,流风所及,科举风气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旧党中坚苏轼知贡举,而其门生李廌则为考生。朝野士人皆以李氏为必中。然廌竟下第。故流言风起,逮及南宋,至有东坡泄题给李廌而为政敌之子章氏兄弟窃取之不经之论。故此有必要溯本求源,去伪存真,以期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关键词] 苏轼;作弊;李廌;元祐三年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3.019

Identification for Su Shi on Cheat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you Emperor and the Reason Why Li Zhi Failed

Qian Jianzhu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ighting between parties was fierce and it influenc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you Emperor, Su Shi, the key figure of the old party, host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is student Li Zhi took the exam. People all thought Li would pass the exam for sure but he didn't. Rumor went around as to that Su leaked the paper to Li and it was stolen by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the brothers of Zhang. Howev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fficials who hosted the examination were supervised by the government at every step. Upon being given the position, Su was supervised. In additio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you Emperor, before Su was appointed to manage the examination and moved into the examination site on January 21st o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he was often accused by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for writing the paper. Therefore, it was difficult and not reasonable for Su Shi to leak the paper to his student. The true reason why Li failed was his lack of ability and learning.

Key words : Su Shi; cheating; Li Zhi; the third year of Yuanyou

[收稿日期] 2007-06-2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项目(D05006)

[作者简介] 钱建状,男,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宋代文学与历史研究。

北宋元祐年间,虽新党失势,旧党执政。然新旧两党、旧党内部仍争斗不已。流风所及,国家抡才大典之科举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权知贡举。然苏轼未入贡院,即有“先言任意取人”^{[1]1816}之传言弥漫朝野。是年,苏轼之门人李廌亦厕身于省试举子之中。李氏乃苏门之翘楚,久为东坡所知,故“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按,李廌字方叔)也”^{[2]824}。李廌文名甚著,而苏轼适时知贡举。于情于理,李氏高中,亦为时人所逆知。然事与愿违,是年三月省试放榜之后,李氏非但未能高中魁首,尽榜之后,亦无其名。世事相违,每如此也!苏门高足李廌之下第,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故当时士人,每有感慨乃至惊诧之言。朝士吕大防叹曰:“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3]13116}朱弁《风月堂诗话》亦载:“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

李廌缘何落第?自北宋末迄南宋灭亡,每有士人揣测之。然这些揣测,得之于传闻者多,而得之于事实者少。兹以时代先后为序,分而述之,并依据相关史料,对其妄说不经有损东坡名节者,予以驳斥。

李廌参加省试,苏轼为知贡举,黄庭坚为参详官。故苏、黄与李廌本人的意见值得重视。李廌落第后苏轼曾赋诗自责:“余与李廌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黄庭坚也次苏轼诗韵,赋诗安慰李廌。苏诗曰: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纈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臞仙。

苏轼之诗意可分四层:(1)以书法为喻,夸耀李文如南朝吴质之书法,笔势翩翩。(2)引《唐摭言》李程因赋《日有五色赋》而得状元之事,暗喻自己当负遗才之责。(3)直言此举参试士人太多,自己作为主考官,偶或遗贤,作为考生的李廌,当能谅解。(4)希望李廌潜心学问,并预言李廌并非池中之物,一定有科场进身的机会。

黄庭坚之诗题为《次韵子瞻送李豸》:

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

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

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

黄庭坚之诗意与苏轼大同而小异,大意是将李廌比作未被伯乐识别出的千里马,其文瑰奇,可方之于唐代古文家李翱。东坡作为主考官,失取此一奇才,难塞其责。这与东坡的看法是一致的。唯一不同之点是,黄庭坚认为李之下第,原因在于运气较差,这就如同赌场射利,胜负只是凭运气而已。

李廌本人对于落第的看法,虽然掺杂了落第举子的悲怨之情,但对于落第之原因,与苏、黄并没有本质之不同。其《下第留别舍弟弼》有句云:“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胸中经纶策,偃蹇未获试。《下第留别陈至》诗亦云:“余生天地间,动辄多愿违。天王十二闲,玉勒黄金鞿。奈何骥与驂,不使备六蜚。盐车初未脱,伯乐第兴悲。宁甘生刍饿,不为场藿嘶。京都足风埃,士气亦随淄……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

李廌生于嘉祐四年(1059),至元祐三年,正好30岁,故这两首诗必为元祐三年落第而作。揆其诗意不难看出,李廌认为自己满腹经纶,但命运不济,主试官(“伯乐”)未能看中自己的文章,故而落第。这与他的另一首诗《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乞诸公

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所云有一致之处。所谓“平生功名众所料，数奇辜负师友责”，与黄庭坚“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颇有相通互证之处。

二

苏、黄二人送李廌的诗，对后世士人的影响甚大。特别是苏诗中将李廌比作唐代状元李程，每为后人所踵事增华，而不经之论亦出矣！南北宋之间，士人传言此事，尚与事实不远。任渊注黄庭坚《次韵子瞻送李豸》诗曰：“李豸字方叔，阳翟人，素为东坡所知。元祐三年，东坡知贡举，得程文，异之，谓必方叔，擢置第一。既开榜，非是。东坡怅然，作诗送方叔，有‘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之句。”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东坡知贡举，李豸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矣。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

任渊所谓李豸“素为东坡所知”，朱弁所谓“李豸方叔久为东坡所知”，皆从苏诗序言中“余与李廌相知久矣”之句而来；而“谓必方叔，擢置第一”、“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等语则从东坡“过眼终迷日五色”之句化出。

朱弁、任渊皆为北宋末、南宋初士人。据《黄陈诗集注序》，任渊曾亲侍山谷，自政和辛卯（1111）年始，即曾取黄、陈“二家之诗，略注其一二”。其时离山谷下世仅数年而已，故其成书虽在绍兴间，然其所记，当最近事实。《风月堂诗话》成书于绍兴十年（1140），系朱弁使金时所作。故以黄庭坚之作为原唱，记忆稍误，但所记并未过于失实。而时间推移到南宋中期后，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一〇中，或因年代稍远，情节中则颇杂虚构之辞：

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甚可哀也。

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应试，又落第。故赋诗有“数奇辜负师友责”之语，并有绝意科名之意。其诗题曰：“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诗，今年秋复下第，将归耕颍川，辄次前韵上呈内翰先生及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可证。《老学庵笔记》卷一〇所谓“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云云，即据此而来。这则故事所可注意者是首次提到元祐三年的省元章援（字持平）。南宋末之罗大经《鹤林玉露》以及同时而稍后的赵溍《养病漫笔》即据此再次虚构：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緘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预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太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者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此段文字，所谓其母云云，直抄陆游《老学庵笔记》。山谷之贺词则从《槅溪居士集》卷一〇《跋

葛圣功诗》补辑而来:“圣功试南宫,论周秦强弱不变之弊,如太仓公言病,洞见根穴所起。东坡奇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为太和令时所与唱酬进士也。因相庆得人。’但据《文忠集》卷二〇《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载:“元祐三年,东坡先生嗣典斯文,即文观行,所得为多。是举也,奉议郎葛公奏名第七。”可见,所谓“二十名间……乃葛敏修”云云,亦是失实之词。

此外,文中所谓“及拆号”、“坡失色”云云,揆之于宋代科举阅卷程序,亦显为失实之辞。北宋真景朝以后,省试试卷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加以处理。先是封弥、誊录、初考、覆考、定号,最后方将录取名单及试卷交尚书省上奏,谓之“奏号”。而奏号之后,其程序即是“拆号”。欧阳修《和出省》诗原注曰:“国朝之制,礼部考官卷子,奏上字号,差台官一人拆封出榜。”《梦梁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闈》条载:“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宋会要辑稿·选举》记录拆号程序则更详细:“所差拆号官率以下晡到院,先即封弥所点号整足,然后入院,往往夜漏既上拆号,抵明方毕。”可见,“拆号”这一科举考试程序系朝廷派专人负责。苏轼作为知举官,“拆号”并不属其职责范围。文中其余文字谓东坡私泄考题,纯为虚构,颇有损东坡之名节。故清人查慎行注苏诗时直斥为“此必章惇夫子造为此语以诬公”。今按,谓东坡徇私情授题给门人李廌,其不能成立之原因有二:

其一,北宋有严格的锁院制度。宋代自立国之初,即开始有意制定规范控制知贡举官的权力。首先是分割知贡举官的事权。一变唐代政府知贡举官多由礼部侍郎担任的作法,知贡举官成为皇帝临时任命的一种差遣。开宝八年(975)二月起,又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其次就是建立锁院制度,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淳化三年(992)正月起,规定知贡举官奉到简任诏命必须立即赴贡院,以避请求,谓之“锁院”。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十二日又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试官更不得乞上殿呈题目,并令门辞,差官伴入院锁宿。”^{[4]36}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二十三日诏:“今后所差考试发解并知举官等,宜令于闱门候敕,出召到昼时,令闱门祇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话,如违,仰引伴使或闱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4]334}由此可见,北宋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都有朝廷派人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大中祥符七年知贡举王曾受审查一案,颇见北宋政府对知贡举防范之密与监督之严。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一八载:“先是,王曾等授解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殿闱子,至审刑院伺候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闱门祇候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即令曾、惟演分析,与李维词同,特放曾等。”知贡举一旦受敕之后,不仅有专人押伴,且不得与人私语,不得迟留。如此对知贡举进行防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机密,禁止“请嘱”。对当事人——知贡举来说,知法犯法,故意泄露朝廷机密,更是为法所不容。真宗朝以后,科场条例与防弊措施日渐严密。凡斯种种,苏轼作为朝廷的参政要员,对此不可能不知,作为知贡举的他,纵爱其门生心切,也不可能不对朝廷法令有所顾忌。因此,从制度这个层面来说,所谓“将锁院,坡緘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这一事情是绝难发生的。

其二,苏轼在元祐初年屡次因考试问题受到政敌的攻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载,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论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伏望“正考试官之罪”,矛头直指进题者苏轼,后经殿中侍御史吕陶疏救,苏轼才免受中伤。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先后论苏轼试廖正一策题,认为苏轼所出馆阁策题,“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用心,罪不可赦”^{[5]9915}。元祐三年正月十九日,苏轼入贡院之前二日,侍御史王觐又以去年苏轼所试馆职策题借古讽今为由,认为苏轼不宜留在朝廷^{[5]9923}。是年二月初二日,在苏轼锁院期间,监察御史赵挺之再次发难,以风闻“外议以为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若见引用《新义》决欲黜落”为由,“请礼部贡院将举人引用新经与注疏文理通行考校”^{[5]9925}。

从上述史料可知,苏轼在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并入试院之前,因学士院试馆职撰策

题而屡受政敌的攻讦。即或入贡院之后,仍有政敌如赵挺之等“因浮议以献言,用情诬实”^{[5]19925}。故其知贡举时之举止言谈必然会谨小而慎微,以免政敌再次有可乘之机。从现存的元祐三年省试策题来看,其中所提问题皆颇为温和,即为苏轼小事履行知贡举事的有力内证。从苏轼知贡举前后如履薄冰之心理状态,不难逆推,所谓“将锁院,坡緘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也是绝难发生的。故清人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年集成总案》卷三〇中说:“公屡奏未了榜时,党人先有失士之论。盖自知举命下,董敦逸已论奏必不当,其余造作不一,而流传小说,多有章援、章持窃得李廌策题之说。此不足道也。”附带说明一下,据《隐居通议》等书的记载,宋代州试的命题由主考官与监考官、同院考试官共同商定。由此推断,宋代省试试题同样由知贡举与同院考试官参详而定,未必是一人独断而成。因此,即使苏轼事先透题给其门生李廌,师生共同作弊也未必一定能成功。

三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云:“欧阳公之司贡也,疑苏公为曾南丰,置之第二,然南丰时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苏公司贡,则不惟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观其与李方叔诗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将愧之者。然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怀欧公之疑而负苏公之愧,古道其庶几乎!”魏了翁之论,是否针对因李廌落第而产生的不根之言而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议论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两点:

其一,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元祐三年省试中李廌及不少苏轼故人的落第,正是苏轼“无情如造化”之笔,秉公而断之结果。苏轼赠李廌诗所谓“一时之愧”应当理解成苏轼对门生科场失利的惋惜之情,而不能理解成“伯乐不识千里马”的羞愧之意。因此,所谓“过眼终迷日五色”是一种谦词,也是一种托词。黄庭坚元祐三年省试锁院时曾对东坡的文章鉴别力下过一赞语,谓“其他在间伎俩,诸君或胜东坡,至于评论文章,东坡鼻端一嗅,可定优劣”。此语传出后,“诸生皆以为然”^{[6]1815}。黄庭坚与东坡的对话提示我们,李廌省试落第,并非东坡不识真文章,而是其本身的程文未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其二,从考生的角度来看,李廌之省试科文,可能并未达到“斯文如女有正色”的境界。宋人极重文章有老成之境,元祐三年省试中之李廌,尚未及而立之年,行文好为奇丽之言,然积学不厚,尚未至老成之境。故其科文未入东坡法眼,似亦不为过。李廌之《兵鉴》,向为后人所重视。四库馆臣认为“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局促辕下者异焉!”^{[7]1331}然苏轼在元祐初年给李廌的信中却说:“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苏轼为翰林期间,尝在信中评李廌所献之文曰:“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尔”。尺牍之言,乃作者真实情感之流露,故苏轼这两则议论说明青年时的李廌,其文章尚欠火候。有鉴于此,清代学者王文诰论断说:今“录公原书,观书(笔者按,指苏轼《与李方叔书》,载《苏轼文集》卷四九)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轼)再知举,未见其必售也”。王文诰之言,并非仅为骇世之言。

自熙丰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考试之内容亦为之大变,由诗赋取士一变为论策取士。“诗赋可以观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4]从苏轼对青年时期的李廌的评介来看,其积学尚不深厚,故发而为文,“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有“过相粉饰”之病。也就是说,此时之李廌,若考诗赋,则可见其辞艺

《苏轼文集》卷七载是年省试策问三首,标题为“汉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宰相不当以选举为嫌”、“省冗官裁奉给”。策题有正文,因文繁不录。另据《师友谈记》,尚有一题策问月令,论题当为《扬雄优于刘向论》;又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论题则为“光武何如高帝论”;又据《省斋文稿》卷一〇,则论题为“周秦强弱论”。

奇丽之处,若考策论,则显其才识不足之病。不幸的是,元祐三年进士科考试之内容,依然一仍熙丰之旧,正是以经义与策论取士。李廌之“数奇”,或在此乎?

李廌省试时之策题程文,今虽不能窥其全豹。但因李氏在《师友谈记》中之回忆,幸有片言存焉。是书《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时气》条载:“太史公(指范禹)讲月令……廌在元祐三年省试,策问有魏相时令者,廌之所对,大略与太史公之说同。但其卒曰:‘王者应天以实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应之,不必法其繁文末节,但时和岁丰,家给人足,则便为太平之实。若求夫芝草生、凤凰至等瑞,皆汉代君臣不务本,而区区尚其虚文也。汉之好复古者,无右王莽,而刘歆又以儒术缘饰之,奏祥瑞、作颂声者甚众,有益于治,有救其乱乎。’词多不能详,姑记其大概,昔既不效,何必道乎!”李氏特意摘出策文之结论与精彩部分。但私意以为,即或由此衡文,李氏之程文,尚不能与“笔势翩翩”名实相符。即或“奇丽”二字,似亦不能当之。显然,“论”之文体限制了他才情的发挥。《师友谈记》作于元祐八年(1093),李廌在回忆五年前省试策题时,以“昔既不效,何必道乎”两句作为自己下第原因的总结,不知是出自真心否?

[参 考 文 献]

- [1] 苏轼:《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苏轼文集》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Su Shi, Qiba Xueshi Chu Xianman Chaqian Zhazi, in *Sushi Wenji*: Vol. 2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2]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Zhu Bian, Fengyuetang Shihua (), in Kong Fanli, *Sushi Nianp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3] 脱脱:《李廌传》,《宋史》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Tuotuo, Li Zhi Zhuan, i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Vol. 20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4] 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Xu Song, Song Huiyao Jigao, Xuanju, in *Xuxiu Siku Quansh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Li Tao, *Continuation of the General Object Lesson to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6] 黄庭坚:《山谷老山刀笔·答王观复第二简》卷一五,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Huang Tingjian, Shangu Laoshan Daobi, Da Wang Guanfu Di-er Jian: Vol. 15, in Kong Fanli, *Sushi Nianp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7] 永瑢:《济南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Yongrong, Jinanji Tiyaoyao, in *Siku Quanshu Zongmu*: Vol. 15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本刊讯:2008年3月14日,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卡特”中心)主办的“中国农产品应对国外SPS措施”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研讨会主要对由商务部委托的《中加小农适应全球市场发展》项目和教育部“985”工程资助、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承担的“中国农产品出口应对SPS措施和反倾销:问题、挑战与政策措施”课题的前一阶段工作进行总结与研讨。在研讨会上,代表们做了“中国实施WTO/SPS协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专题报告。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在具有受政府高度重视、成本价格优势、巨大的国内外市场潜力等机遇的同时,还面临疫情和病虫等问题。